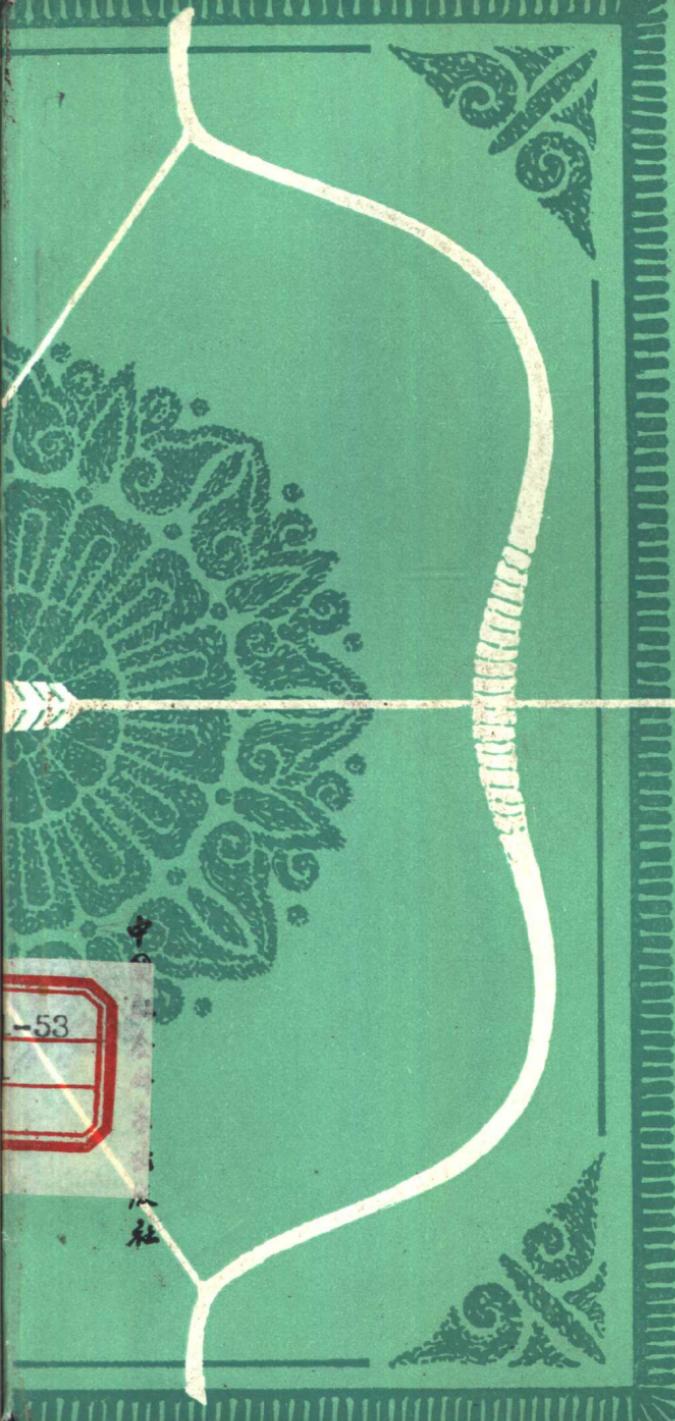


国外实践研究概况



国外突厥学研究概况

(译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许浩福 陈 鹏 编译

陈 伟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突厥学研究概况

(译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¹/₂印张 135千字

1980年5月第一版 198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9190·013 定价：0.85元

译者的话

为了便于语言学家、民族语文工作者，特别是阿尔泰、突厥学研究人员了解国外的突厥学研究情况，更好地开展突厥学研究工作，我们搜集和翻译了九篇文章，汇编成《国外突厥学研究概况》（译文集）出版。本书共介绍了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西德、日本、瑞典等八个国家的突厥学研究情况，其中涉及突厥学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史、研究机构、人员、成果以及当前的研究任务。

本书所收的九篇译文译自苏联《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突厥学》两种杂志。其中除《日本的突厥学研究情况》一篇由陈鹏同志翻译外，其余八篇均由许浩福同志翻译。全书由陈伟同志校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因此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 苏联科学院的突厥语言学………[苏]A.H.科诺诺夫 (1)
匈牙利的突厥学研究……………[匈]J.K.卡库克 (31)
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
 突厥学情况……………[西德]Г.焦费尔 (57)
捷克斯洛伐克突厥学的现
 状和发展前景……………[捷克]I.I.布拉什科维奇 (83)
波兰突厥学和阿尔泰学的
 现状和前景 (1964年前)………[波]C.卡卢任斯基 (95)
近十年来(1964—1973)的
 波兰突厥学……………[波]Э.特雷雅尔斯基 (111)
罗马尼亚的突厥语文学研究……………[罗]B.德利姆巴 (132)
日本的突厥语言研究情况……………[日本]C.服部四郎 (160)
瑞典的突厥学……………[瑞典]Г.雅林 (184)

纪念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五十周年

苏联科学院的突厥语言学

〔苏〕科诺诺夫 (A.H. Кононов)

根据1970年的全苏人口调查材料，在苏联有二十五种突厥语言，说这些语言的有三千二百四十万人。突厥诸语言是五个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六个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卡拉卡尔帕克、鞑靼、图瓦、楚瓦什、雅库特）和两个自治州（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哈卡斯自治州）的国语，其他共和国和自治州部分居民也说突厥语。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在苏联人文科学中突厥语言学和突厥学中的其他学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意义。

在俄国对突厥语言进行严格的科学的研究是后来的事，在其以前俄罗斯人曾经历了一个几百年的实际掌握突厥语言的时期，俄语中大量的突厥语借词以及一些生活方式、旧的（彼得一世以前的）宫廷仪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科学的东方学在俄国的出现，应归功于彼得一世的雄才大略，他曾两次派遣青年去波斯（1716年）和萨尔格勒（1724年）“学习土耳其语”。

彼得一世的天才的远见卓识，使他能够透过当时俄国现

实中遍及全国的文盲和野蛮现象，看出俄国科学的伟大未来，从而创立了科学院。

1724年1月28日，彼得一世“命令搞一个科学院以学习各种语言及其他各门科学和著名的艺术，并翻译一些书籍”^①。

在科学院的这些简要的任务中，语言研究被提到首位，书籍翻译（按顺序）列为第三位，这都不是偶然的。研究东西方的语言、翻译外国书籍，乃是历史的需要，而这种历史需要从来都是由于俄国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东方学家戈特利勃（捷奥菲尔）—齐格弗里德·巴伊耶尔（1694—1738）是科学院的第一批院士^②，他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事着许多东方语言的研究工作。在巴伊耶尔的科学兴趣范围内也包括对突厥诸语言的研究：是他最先把现今大家都熟知的阿布一尔—加齐（1603—1664）的名著《突厥人的系谱》（《Шаджара-и тюрк》）中的一章试译成拉丁语的。在关于试解十八世纪初在叶尼塞河上游发现的突厥鲁尼文墓志铭的历史上，也提到了巴伊耶尔的名字。

博物学家彼得—西蒙（彼得·西蒙诺维奇）·帕拉斯（1741—1811）院士（从1767年起）对搜集和发表叶尼塞河流域的鲁尼文碑铭的历史有所贡献^③，他还作为《各语言和

① 见Г.А.克尼雅泽夫，А.В.科列佐夫著《苏联科学院简介》。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7年，第10页。

② 在1724年的草案中，称那些成为科学院的正式成员的学者为院士，在当时和后来的许多其他正式文件中，把他们称作教授（见《苏联科学院史》，第一卷，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8年，第35页）。

③ 见А.Н.别伦什塔姆著《六一八世纪鄂尔浑—叶尼塞河流域的突厥人的社会—经济结构》。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46年，第13页。

方言比较词典》初版的编辑而载入俄罗斯词典编纂史的史册。（参见下文）

从事研究近东诸语言，其中包括突厥语言的东方学家、外事委员会的译员格奥尔基—雅科布（格奥尔基·雅科夫列维奇）·凯尔（1692—1740）积极参加了科学院的工作（他论述了所搜集的“鞑靼”货币，并作了报告），他还担负着教授俄国青年学习“东方语言”的任务^①。

由于对两个重要的历史文献——扎希尔·阿德—季纳·巴布尔（1482—1530）的作品《巴布尔传》（《Бабур-наме》）^②和阿布—尔—加齐的《突厥人的系谱》（《Шаджара-и тюрк》）的研究，Г.Я. 凯尔的名字被载入了俄国突厥学史。在他拟定的《为俄罗斯帝国谋利和增光的东方科学和语言研究院或协会》^③的方案中，表现出 Г.Я. 凯尔对俄国在研究东方方面所面临的任务有深刻的理解。

因此，巴伊耶尔和凯尔这两位学者乃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圣彼得堡东方学的代表人物，这两位学者在他们的学术活动极盛期间却去世了（Г.-З. 巴伊耶尔卒于1738年，Г.Я. 凯尔卒于1740年），而且也没有继承他们事业的门生。1747年7月24日的新《圣彼得堡帝国科学艺术院章程》规定把人文科学转到专科大学，这一重要事件更加重了因这两

① 见B.M.丹齐格著《俄国的近东研究》。莫斯科，1968年，第7—12页。

② 详见Г.Ф. 勃拉戈娃著《俄国〈巴布尔传〉研究史》。——《突厥学文集》，莫斯科，1966年，第168—176页。

③ 详见A.H.科诺诺夫著《俄国突厥语研究史，十月革命前时期》。列宁格勒，1972年，第33—45页；58—69页。

位非常卓越的东方学家的逝世而造成的损失。因此，东方学和其他一些历史—语文学科一样，已不再是国家高等学术机构里的一个学科了。但科学院考察团的成员们仍担负着搜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的语言、人文和考古资料的工作，他们在整个十八世纪时期内起了很大的作用。科学院在补发给考察团的指令中，命令他们承担起搜集“各种非俄罗斯语言材料……”的任务^①。

当时，在科学院范围以外，搜集和整理突厥词汇材料的工作并未停止，并为同操突厥语居民进行交际而编写了各种常用的词汇表和词典。各档案馆存有大量此类词典的试作，其中《俄罗斯—鞑靼—卡尔梅克语词典》（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列宁格勒）占有特殊的地位，这部词典是由著名的学者和国务活动家B.H.塔季谢夫（1686—1750）发起，在他开办的爱伦堡鞑靼—卡尔梅克学校编写的^②。

由B.H.塔季谢夫编写的《俄语历史、地理、政治和民事词典》（字母A—K，圣彼得堡，1793年）和由许多人集体编写的《各语言和方言比较词典》（I—I卷，圣彼得堡，1787—1798年；第二版：圣彼得堡，1791年；其第一版由П.С.帕拉斯校订出版，第二版由Ф.И.扬科维奇·杰·米里耶沃校订出版）是两部大辞典，这两部辞典在俄国的俄语和突厥语辞典编纂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B.H.塔季谢夫的《词典》对许多东方语，主要是突厥语的族名、地名、地理、历史和民族志学的术语作了解释。

① 见B.Ф.格努契娃著《13—19世纪科学院考察团的历史资料》。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报告集》，第四期，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

② 见A.H.科诺诺夫著《著作目录》，第70—84页。

在《……比较词典》的第一版中有十九种突厥语言和方言的词汇材料，在第二版中已经有了二十四种突厥语言和方言的词汇材料。为了编写《……比较词典》搜集了一些材料，而手写本的《下戈罗德教区各民族（俄罗斯人、鞑靼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和车累米西人）语言词典》（是在下戈罗德和阿拉提尔教区的至圣者大马斯金主教的监督下于1785年编写的）就是利用这些材料编成的。

同年（1785年），“为了便于在喀山中学就读的青年学习鞑靼语”，编写了手写本的《俄语—鞑靼语词典》（已知有三种抄本），作者是第一个向俄罗斯人传授鞑靼语的萨基特·哈利芬。佚名作者所编写的《楚瓦什语词典》的手抄本也已确定是1785年编写的。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有《土耳其语词典》的手抄本（圣彼得堡，1793年）。

由于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因此匆忙地从法文翻译出版了《土耳其语语法》（或《学习土耳其语简易法》）一书的两种译本（第一种为圣彼得堡1776年版）；第二种译本于1777年在莫斯科出版^①。

十八世纪末，在鞑靼语语法研究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1801年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印刷厂出版了И.И.基加诺夫（卒于1800年）于1798年完成的名著——第一部《鞑靼语语法》，M.B.罗蒙诺索夫的《俄罗斯语语法》对基加诺夫的语法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②。我国突厥学家语法思想

① 详见A.H.科诺诺夫著《著作目录》，第181—183页。

② 见M.З.扎基耶夫著《罗蒙诺索夫的思想在突厥学家喀山学派的语言学观点形成中的作用》，载于《喀山国立师范学院学报》第74期，突厥学问题。喀山，1970年，第15—20页。

的形成是与M.B.罗蒙诺索夫在俄罗斯语言学中创始的语法思想、语法观点和语法系统图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此苏联突厥学家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我国俄语语法学家、语音学家和词汇学家的科研成果对于俄国的突厥语言学发展的影响。

十九世纪初，在科学院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1803年7月25日批准了新的《帝国科学院章程》，按照这个章程，人文科学（历史学、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重新列入“科学院所应从事研究的学科”之中。

虽然在新的章程中只字未提语言学和东方学，但是由于人文科学又并入到科学院，所以也附带着把它们列入科学院的研究计划内（1804年），随后把德国天才的东方学家根里赫—尤利乌斯·克拉普罗特（1783—1835）选为编外院士（1807年），但是，他在俄国的七年时间内并没有给俄国东方学带来什么重要的东西^①。

自修成功的突厥学家Г.И.斯帕斯基（1783—1864）是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代史方面的第一个通讯院士（从1810年起），现在所发表的西伯利亚各突厥语言的词汇材料是他搜集的，他还是《西伯利亚古代史》一文的作者。此文对于突厥鲁尼文碑文的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

科学院亚洲博物馆（1818—1930）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前身^②，它是东方学第一个科研机构。亚洲博物馆

① 见A.H.科诺诺夫著《著作目录》，第96—98页。

② 见《亚洲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莫斯科，1972年。

的第一任馆长是东方古代史方面的正式院士（从1817年起）X.Д.弗连（1782—1851），他是一位阿拉伯学家，在突厥学的历史上曾有过重要的贡献。他系统地整理和论述了科学院的突厥文手稿和古钱搜集品，发表了许多关于突厥民族史的论文，同时与喀山的学者伊勃拉基姆·哈利芬（前文提到的C.哈利芬的儿子）合作，出版了阿布—尔—加齐的著作《突厥人的系谱》的突厥文原本。

《帝国科学院章程》（1803年）的《补充规定》（1830年1月30日）中有两处特别提到“亚洲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学”，看来这与X.Д.弗连的积极的学术活动是有关系的；在《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章程》（1836年1月8日）里，把“东方文学和古代史”看成是科学院当之无愧的有代表性的一门学科。由于东方学被正式承认为科学院中的一门学科，所以在短期内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东方学家的一些享有世界盛名的名著就是证明。

在И.И.基加诺夫的上述著作发表以后，又出版了许多主要是描写鞑靼语语法结构的著作^①，但是由于И.И.基加诺夫的语法有某种独到之处，所以仍具有其意义。

从科学院通讯院士米尔扎·亚历山大·卡泽姆一别克（1802—1870）^②的获得杰米多夫奖金的《土耳其—鞑靼语普通语法》（喀山，1846）一书问世起，就进入了俄国突厥语语法研究史上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原先发表的《土耳其—

① 详见：M.З.扎基罗娃著《对鞑靼语语法的历史评论》。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喀山，1951年，20页。

② A.尔扎耶夫著《米尔扎·卡泽姆一别克》。巴库，1965年。

鞑靼语语法》（喀山，1839）的第二版的修订本，作者增添了许多新的语文研究材料。

卡泽姆一别克的《普通语法》同基加诺夫的《鞑靼语语法》一样，是一部突厥诸语言的比较语法，而且卡泽姆一别克还是俄国第一个使用蒙古语的类推法来扩大被比较语言的范围的学者。总而言之，他的《普通语法》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好评（И. Н. 别列津、Б. Б. 格里戈里耶夫、Б. А. 多尔恩、О. Н. 标特林克等等）。这部语法由Ю. - Т. 增克尔译成了德文（来比锡，1848），而且长期以来都是俄国和西欧研究土耳其语的主要参考书。

著名的梵语学家、优秀的突厥学家、出色的语言学家О. Н. 标特林克（1815—1904）院士在俄国突厥语研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是《论雅库特人的语言》（圣彼得堡，1851，德文本）一书的作者，这一著作至今仍未失去其科学价值^①。

科学院很乐于支持非科学院编制内的学者们。由科学院发起，并由它负担经费，根据它的指令，由芬兰学者М. А. 卡斯特连（1813—1852）^②组织了一次考察（1845—1849），这次考察对于研究西伯利亚的民族、语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在А. А. 希弗涅尔（1817—1879）院士（А. А. 希弗涅尔是М. А. 卡斯特连十二卷本的科学遗著^③的编辑兼出版

① 见《О.Н.标特林克及其著作〈论雅库特人的语言〉》文集，雅库茨克，1973年。

② 见《纪念 М. А. 卡斯特连》文集。列宁格勒，1927年。

③ Nordische Reisen und Forschungen. Im Auftrage der kais.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A. Schiefner. Bd I—III. St.—Pb., 1853—1862.

者）的帮助下，发表了M. A. 卡斯特连的科伊巴利语和卡拉卡斯语语法^①，这是突厥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科学院通讯院士O. И. 先科夫斯基（1800—1858）是彼得堡大学的第一个土耳其语教授（从1822年起），是教学参考书《土耳其口语的一些基本规则》（圣彼得堡，1829，76页）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但他作为记者、《文库》杂志的编辑和文学家^②，却较作为突厥学家更为有名。

科学院通讯院士H. И. 伊利明斯基（1822—1891）在突厥学历史上占有光荣位置，他是从事哈萨克语研究的奠基人，他出版了《巴布尔传》（《Бабур-наме》）（1857）、拉勃古齐的《安比亚的故事》（《Кысас ал-анбийа》）（1859）的原文；又是《阿尔泰语语法》（喀山，1869）一书的编辑和作者之一。

我国突厥学家出版的许多突厥语词典中比较突出的有：《察哈台—土耳其语词典》（圣彼得堡，1868—1869），其作者兼出版者是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自修成功的东方学家B. B. 维利亚明诺夫—泽尔诺夫（1830—1904）院士；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副教授，外交部亚洲司五级翻译Л. З. 布达科夫（1812—1878）的《土耳其—鞑靼方言比较词典》（I—I卷，圣彼得堡，1869—1871）；新突厥学创始者

① Bd II. Versuch einer Koibalischen und Karagassischen Sprachlehre nebst Wörterverzeichnissen aus den tatarischen Mundarten des Minussischen Kreises. 1857. XIX + 210页。

② B. 卡维林著《О.И. 先科夫斯基（巴隆·勃拉姆别乌斯）。生活和活动》——《全集》，第六卷，莫斯科，1966年，第283—477页。

B. B. 拉德洛夫（1837—1918）院士的《突厥语方言词典试编》（圣彼得堡，1893—1911），通讯院士（从1927年起，后从1931年起为名誉院士）Э. K. 佩卡尔斯基（1858—1934）在Д. Д. 波波夫和B. M. 约诺夫的直接参加下编写的《雅库特语词典》（I—I卷，圣彼得堡，1907—列宁格勒1930），以及楚瓦什语言学的奠基者Н. И. 阿什马林（1870—1933）的《楚瓦什语词典》（喀山一切博克萨雷，1928—1950）。

十九世纪中叶是我国和世界突厥学历史上的新时期，这与B. B. 拉德洛夫1858年在西伯利亚的巴尔瑙尔市开始并于1918年5月12日在彼得格勒结束的科学组织工作及其社会活动是有密切联系的^①。

K. Г. 扎列曼（1849—1916）^②是著名的伊朗学家，与B. B. 拉德洛夫同时成为科学院士，他共发表了十一部突厥学著作^③。

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内，科学院的全体院士中只有B. B. 拉德洛夫是“专业的”突厥学家多面手，他不仅研究现代诸突厥语言，也研究鲁尼文、维吾尔文、阿拉伯文的突厥文献，研究突厥语词汇学和词典编纂法、方言制图学和方言学以及突厥民族学和考古学。

B. B. 拉德洛夫从未在大学任教，但在彼得堡生活时

① 见《突厥学文集，1971年》，莫斯科，1972年。

② A. Г. 佩里哈尼扬著《卡尔·格尔曼诺维奇·扎列曼》。

——《俄罗斯东方学史论文集》第四集，莫斯科，1959年，第79—115页。

③ 《帝国科学院院士人名资料辞典》，第一册，字母 А—Л。彼得格勒，1925年，第294页。

期（1884—1918），曾有过一些“业余的”学生，这就是H. Ф. 卡塔诺夫（1862—1922）、П. М. 麦廖兰斯基（1868—1906）、А. Н. 萨莫伊洛维奇（1880—1938）、С. Е. 马洛夫（1880—1957）。他们对突厥学的研究局限于比较窄的范围，而且是在比较有限的事实材料基础上进行的。

H. Ф. 卡塔诺夫的志趣是研究民族学，只是偶尔研究一点语言学（利用与其本族语言相近的语言材料）。П. М. 麦廖兰斯基成了俄国第一个突厥语言学家。А. Н. 萨莫伊洛维奇虽然偏重于突厥语言学，但在突厥文艺学和民族学方面也作了很多工作。С. Е. 马洛夫是B. B. 拉德洛夫生前最后几年中最亲近的学生，他（正如谢尔盖·叶菲莫维奇自己所说，按照自己“业余”导师的建议）集中研究了中央亚细亚和中国西部的一些现代突厥语言以及鲁尼文和回鹘文文献。

由于B. B. 拉德洛夫和К. Г. 扎列曼的多方努力，Ә. К. 佩卡尔斯基从雅库特的流放中被营救出来。1905年，佩卡尔斯基来到了圣彼得堡，终其余生他都在这里从事雅库特语词典编纂，民族学和民间创作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十九世纪内选出的四个科学院通讯院士（Г. И. 斯帕斯基、О. И. 先科夫斯基、М. А. 卡泽姆一别克、Н. И. 伊利明斯基）中，只有两个人（卡泽姆一别克和伊利明斯基）在俄国的突厥语言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断言十九世纪的俄国突厥学由于许多学者的劳动，特别是由于B. B. 拉德洛夫多年孜孜不倦地搜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可以取得比这更

大的成绩。完全可以用B. B. 巴尔托利德的话来评价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突厥学：“通观俄国研究东方的各种著述，俄国科学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大部分仍然远远不符合于俄国的地理位置、俄国居民的成分和从彼得大帝时起各代人的劳动所赋予的期望”①。

* * *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向突厥学以及整个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

为使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苏联东部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突厥学家必须首先解决文化革命中的一些迫切问题：用更现代的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新文字②，为各级突厥语学校编写本族语言的教科书等等。

为了满足在苏联东部进行文化革命的迫切需要，科学院通过C. Ф. 奥利丁堡、H. Я. 马尔、B. B. 巴尔托利德、A. H. 萨莫伊洛维奇、C. E. 马洛夫、B.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和科学组织工作。

新的任务导致出现了一些新的东方学机构，老的东方学组织也接受一些新的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列宁格勒就有下列一些机构对东方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突厥语言学）进行研究：1) 科学院亚洲博物馆；2) 科学院人

① B. B. 巴尔托利德著《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二版，列宁格勒，1925年，第294页。

② 见《有关土耳其（即突厥）语使用拉丁字母问题讨论会的记录汇编》。——《俄罗斯科学院通报》，第四类，1924年，12—28期，第653—662页。